

※柳存仁先生紀念專輯※

柳雨生與日本—— 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親日」派文人的足跡

杉野元子* 著 林愷胤** 譯

一、戰後的上海

一九四五年（以下省略「一九」）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茲坦宣言〉投降，這不管是對當時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區域的中國人，或是日本占領區域裏持續抵抗日本及頑強地採取不合作立場的中國人來說，都是天大的好消息。然而，曾經和日本軍隊、政府及汪精衛政府有關的中國人卻面臨被貼上「漢奸」標誌的恐懼。武田泰淳曾經在短篇小說〈獸之徽章〉（1950年）中，如此描寫日本戰敗後的上海。

這兩個字（指「漢奸」這兩個字）在戰後的上海，就像搖搖晃晃被運送著，且白又肥的豬屍體所染紅的刀口一般，無論在多麼熱鬧的街，或者多麼寂靜的密室，都緊緊依附著人群，難以散去。遠比日本常聽到的「戰犯」二字令人反感，且帶有難以忍受的臭氣飄散著。充滿難以原諒的邪惡、間諜、背叛、非人性的怪物及其他可怕的東西，凝結在一起。只要是中國的人民，都無法從這醜陋的形象旁邊毫無顫抖、無感情地通過。¹

武田泰淳於四四年六月到上海，正好在上海迎接戰爭的結束。小說裏提到戰後上海的情形，應該都是武田泰淳自己的親身經歷。戰後，漢奸的問題在上海扶搖直上。

本文譯自《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5集（2003年10月），頁211-225。

* 杉野元子，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教授。

** 林愷胤，國立臺灣大學日文系學士。

¹ 武田泰淳：〈獸之徽章〉，《新潮》第545號（1950年10月），頁174。收錄在《武田泰淳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第3卷。

接收上海的蔣介石從九月開始逮捕漢奸，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布「處理漢奸案件條例」十一條，規定漢奸的法律制裁對象；十二月六日公布「懲治漢奸條例」十六條，明列漢奸的刑責，並以四六年底為舉發漢奸的最後期限，迅速展開漢奸的逮捕及審判。根據四七年《上海年鑑》，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四六年度新受理的漢奸案件達到一二八七件²。而四八年的《中華年鑑》紀錄，四五年九月至四七年十月間，第一審判決確定的刑事案件中，適用「懲治漢奸條例」的案件全國有二〇〇〇一件，其中上海九二六件，南京五二一件，江蘇省二〇四八件，浙江省三七一件³。

戰後的上海就瀰漫著這種逮捕漢奸的風潮，本文提到的柳雨生（本名柳存仁）也因此遭到逮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本來默默無名的他，突然展露頭角，八頭六臂的活躍在上海文壇，不僅參加四二年至四四年召開三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與日本文人有相當好的交情，戰後還背負「文化漢奸」服刑三年。與柳雨生相關的研究包括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Edward M.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迺翔、黃萬華《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海林〈《風雨談》その言説に包含された真実と虚構〉（收入《淪陷下北京一九三七—四五：交争する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東京：三元社，2000年〕）等等，內容都集中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日本文獻也不夠重視，只有在四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日本學藝新聞》刊載的周海林論文中，提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相關紀錄。

因此，本稿不只採用中文文獻，也廣泛利用日文文獻，並且交雜柳雨生自己的話及中日同時代文人各方面不同的言論，將柳雨生至今起伏多端的人生，分成太平洋戰爭前、太平洋戰爭時、戰後等三個時期追溯，希望能夠闡明柳雨生為何決定協助日本戰爭，實際上又有那些作為，以及協助日本戰爭最終為他帶來什麼後果？另外，柳雨生在抗戰期間，作為中日文學界的橋樑時，中國和日本間逐漸進展的交流和摩擦，以及號稱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同時，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干涉及侵略等

² 周鈺宏主編：《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年鑑》（上海：華東通訊社，1947年），頁D3。

³ 楊家駱主編：《大陸淪陷前之中華民國——民國卅七年分中華年鑑——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頁483。

方面，也希望能加以闡明。

二、太平洋戰爭開始前

一七年柳雨生生於北京⁴，少年時代已徹底打好古典基礎，二八年移居上海生活一年後，便至上海進入東吳第二中學及光華大學附屬中學（「中學」與日本的國中、高中相當）就讀。中學時代曾向鴛鴦蝴蝶派的雜誌投稿偵探小說，之後又接觸西洋文學和中國新文學，在《論語》、《人間世》等雜誌投稿散文。中學畢業前出版《中國文學史發凡》。

三五年，進入滿心期盼的北京大學國文系就讀，然而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擴大，北京大學雖然移至長沙，但柳雨生並沒有一起行動，隨後回到父親居住的上海，轉進光華大學。原因方面，柳雨生只提到是「家庭的關係」⁵，可能是母親去世後，家裏只剩下父親的緣故吧！光華大學就學期間，柳雨生曾和同學一起發行學術雜誌《文哲》，儘管只有兩年的學習時間，畢業時仍獲得北京大學的畢業證書。大學畢業後曾擔任《大美報》、《大美晚報》、《文史周刊》、《西洋文學月刊》等的編輯，同時也擔任光華大學史學系、太炎文學院的老師以維持生計。四〇年八月，由宇宙風社出版收錄隨筆、小說、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的《西星集》。

四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柳雨生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上海出發的時候也曾經考慮經由香港到內地，但最後還是留在香港，任職香港政府文化檢察官。柳雨生在〈談自傳〉中提到在香港的時候，「曾經和鄒韜奮、茅盾、長江筆戰，後自悔，即止」⁶，但並沒有具體提到論爭的內容。茅盾到香港的時間是四一年三月，馬上就注意到「報紙雜誌（當然是進步報刊）上的天窗比三八年開得更多更大」，檢討後

⁴ 柳雨生四〇年代的經歷，根據《中華日報》、《大陸新報》、《申報》所記載的相關記事、柳雨生：《懷鄉記》（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所收錄的隨筆等。五〇年代以後的經歷，根據張秉權、何杏楓編：《香港話劇口述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所收錄的柳雨生訪談〈柳存仁《在舞臺的邊緣上》〉等。

⁵ 柳存仁：〈記約園觀書〉，《道家與道術——和風堂文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55，原載於張芝聯編：《約園著作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⁶ 柳雨生：〈談自傳〉，《古今》第10期（1942年11月1日），頁16。

認為現在「香港政府那些檢察官的水平確實有了提高」⁷。而鄒韜奮四一年三月到香港，五月十七日復刊的《大眾生活》，裏面的伏字和空白欄卻相當多。柳雨生所謂的「論戰」，或許是以文化檢察官的身分取締鄒韜奮、茅盾、范長江而產生的摩擦吧！

三、太平洋戰爭開始到日本戰敗

（一）從香港到上海

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空襲夏威夷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隨後與英軍交火，進攻香港，十二月二十五日攻下。柳雨生在〈海客譚瀛錄〉中，描寫了當時的狀況：「港島以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重返亞洲人之手。翌年三月十七日予抵廣州，苦住至四月二十八日始得附『筑後丸』返滬。」⁸簡單帶過，四三年五月寫的這篇文章，極有可能為避免日本人的耳目而未透露真正的內心話。

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實行極嚴格的言論管制，只看文獻，很難了解當時人民生活的真相。若柳雨生在戰後能回想當時的情形，寫幾篇文章，倒還可以參考一下，可惜連這樣的文章都沒有。但是，很幸運地，以前研究蘇青的前輩提供了一個可以供筆者判斷的線索，那便是蘇青在戰後不久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續結婚十年》（上海：四海出版社，1947年），書中有一位明顯是以柳雨生作為模型的人物，理論上雖然不能完全採用小說的內容，但本文為了更了解柳雨生生活的樣貌，將這篇小說當作重要的參考對象⁹。

蘇青是在日本占領的上海底下一位相當突出的人氣女作家，代表作《結婚十年》（上海：天地出版社，1944年）、《續結婚十年》等大膽描述蘇青自己的經驗及內心話，引起相當大的迴響。《續結婚十年》以四二至四六年為時代背景，書中人物潘子美可看作以柳雨生為模型的人物。小說的第一人稱「我」（名為蘇懷

⁷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256。

⁸ 柳雨生：〈海客譚瀛錄〉，《風雨談》第6期（1943年10月），頁149。

⁹ 本文認為《續結婚十年》的登場人物：蘇懷青、潘子美、魯思純，與蘇青、柳雨生、陶亢德的實際情況相似，所以判斷其以實際人物作為模型。這也並非筆者自己的認定，早在王一心：《蘇青傳》（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李偉：《亂世佳人——蘇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等也有相同的認定。

青，以蘇青為模型），如此描寫潘子美從香港到上海的經過：

他原本在香港工作，之後香港戰爭爆發，失去了一切。爲了自費留學美國辛苦存的支票也一夕之間化爲烏有。他也曾在香港做過行商，之後坐難民船逃到上海，和年近古稀的老父抱頭痛哭，老父不准他去內地，只好留在上海，當《中國報》的編輯。¹⁰

從這篇小說推測，柳雨生回到上海，和之後不去內地留在上海的原因，應該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不得已的選擇。

（二）汪精衛政府宣傳部

四〇年三月，汪精衛爲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誕生。四二年回到上海的柳雨生加入此傀儡政府，擔任宣傳部編審及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的祕書¹¹。四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表〈新國民運動與青年訓練〉（《中華日報》），四二年七月十一日發表〈大東亞主義的再出發〉（《中華周報》）。又於四二年十二月編纂含〈新國民訓練的開始〉、〈釋新國民運動綱要〉的論文集《新國民運動論文選》，由太平書局出版¹²。〈釋新國民運動綱要〉在四二年元旦汪精衛發表的〈新國民運動綱要〉加了解說，其中柳雨生主張，「大東亞戰爭」的最終目的是爲了解放全體東亞民族及獲得獨立，「中國當然要乘機崛起，與友邦日本合力團結，將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驅逐東亞」¹³。身爲汪精衛政府宣傳部的一員的柳雨生，在這段期間陸續爲政府發表了宣傳政策方針的文章。

¹⁰ 蘇青：《續結婚十年（影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19，原載於《續結婚十年》（上海：四海出版社，1947年）。

¹¹ 蘇青《續結婚十年》寫道，潘子美從香港到上海後，擔任報紙的編輯。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華日報》刊載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華代表會員的簡歷中，柳雨生的介紹爲「宣傳部編審，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祕書」。四〇年八月七日《大陸新報》刊載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海代表會員簡歷的介紹爲「國民政府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設計委員、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審、中華日報主撰、西洋文學月刊編輯、風雨談月刊社社長、上海雜誌聯合會常務理事」。因此柳雨生進入中華日報，應該不是到上海後馬上的事情，而是四二年十一月以後。

¹² 《新國民運動論文選》有日譯本《中國新國民運動論文集》（朝島雨之助譯）（上海：太平書局，1943年）。

¹³ 柳雨生：〈釋新國民運動綱要〉，《新國民運動論文選》（上海：太平書局，1942年），頁170。

（三）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於東京和大阪舉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代表共計十二人，其中從華中選出的有周化人、許錫慶、潘序祖、周毓英、丁雨林、龔持平、柳雨生中國人七名以及南京政府宣傳部顧問草野心平，其中柳雨生年紀最輕。此次會議四日、五日兩天於東京大東亞會館召開，柳雨生以「建立大東亞精神」為題，在四日上午的會議上發言，最後以「我們東亞文學者所要確定的就是打倒他們的思想（英美侵略主義）、盡確立指導精神的責任、全東亞文學者一起樹立東亞新精神」等話作結¹⁴。

柳雨生在日本期間，與許多日本文學者結識，尤其與菊池寬特別親近。菊池寬如此描述柳雨生：

華中地區來的代表柳雨生是位二十七歲有為的秀才，專攻英文學及中國文學，所作之詩也時常發表報刊。／林語堂曾經讚賞他的才氣，勸他去美國留學，柳雨生以時間太久及老父的原因婉拒了，是位頭腦聰明的好學青年。這樣的人物若讓他來日本留學兩三年，研究日本，將來應該可以利用在日華友好交流的用途上。¹⁵

而巖谷大四也對柳雨生有相當好的印象，對他有以下的描述：

中華民國的代表柳雨生，是位二十七歲的美男子，銀框的眼鏡絲毫不會令人反感，怎麼看都是聰明的人，分不清是不是日本人的小個兒，是一位柔軟但內心意志堅強的人。菊池非常喜歡這位青年，帶他去餐廳，讓他住家裏。他英文很好，日文只會幾句。我也和這個人變成好朋友，用英日文穿插聊天，回國後也曾交換公文兩三次。（此人於隔年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又再度前來日本）¹⁶

柳雨生回國後的四三年三月，發表訪日的心得〈異國心影錄〉（《古今》第19期）。柳雨生在此隨筆中，穿插許多軼聞，生動地傳達與日本文學者交流的情況。

¹⁴ 〈特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學藝新聞》，1942年11月15日。

¹⁵ 收錄在菊池寬：〈話語的字紙桶〉，《改造》第20卷第12號（1942年12月），頁95。《菊池寬全集》（高松：高松市菊池寬紀念館，1995年），第24卷。

¹⁶ 巖谷大四：〈中國代表的側臉〉，《私版昭和文學史》（東京：虎見書房，1968年），頁30，原載於《非常時期日本文壇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58年）。

中村利男於四三年四月在《大陸新報》上批判〈異國心影錄〉：「看東京文人的眼光太膚淺了，相當遺憾。」¹⁷柳雨生回應：「我在〈異國心影錄〉中打算大膽提出日本真實、友善及接受日本國民的好意等希望，但卻無法完全辨別日本的實況、日本國民的友善等，這會造成雙方的認識及友善淪為形式化的膚淺，協助東亞解放戰爭也會淪為膚淺且虛弱的理念。」¹⁸柳雨生在〈異國心影錄〉中稱讚菊池寬《恩仇的那方》（譯）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這篇故事的題旨，雖然是講的人與人之間的恩仇關係，可是我覺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論是理智的看法還是感情的衝動，也未嘗不可從這篇小說裏，悟出一番大徹大悟的道理。」¹⁹對此，陳青生批判：「柳雨生的意圖極為明顯。他覺得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的理由其實是想幫助中國脫離英美的支配，是為了讓中國能夠更好，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作家，不管是從理性還是感性方面，都應該感謝日本，放棄抗日，學習中川實之助《恩仇的那方》，與日本攜手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²⁰周海林也提到：「〈異國心影錄〉將大東亞精神以最淺白的方式做感性的敘述。」²¹

的確從〈異國心影錄〉來看，親日派文學家對日本寄予深厚的信賴及敬愛之情逐漸浮現，但這些文學家也同時浮現苦澀的神情。這點也相當值得注意，〈異國心影錄〉中有這樣的一節：

我這一次到日本去，在這個時候，心境的異樣是顯然的，其寂寞和虛空也是顯然的。整個世界都在無邊的戰火中強烈燃燒著，人類的聰明和智慧使自己建設起了一半符合理想的世界，但是虛偽和自私又毀滅了它。整個世界的人類在這場劇烈的搏鬥中，顯明的劃分成兩個堅固的壁壘，每一邊的人都想著，都以為自己是懂得真理和正義的，而對方則全是自私與欺騙。但是，真正的真理，照我個人的愚昧的私見，不應該完全決定於燦爛的戰場，烽火連天的疆場，卻應該決定於暮色蒼茫的微光裏，剛才落過一陣陰涼的秋雨，青苔滿地的翠巖深穴，裏面偃臥的瞑目靜思的赤腳哲人的語言。可是這一位哲

¹⁷ 中村利男：〈大陸的浪漫精神（二）〉，《大陸新報》，1943年4月26日。

¹⁸ 柳雨生：〈東亞文學的戰士〉，《大陸新報》，1943年5月4日。

¹⁹ 柳雨生：〈異國心影錄〉，《古今》第19期（1943年3月16日），頁90。

²⁰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16。

²¹ 周海林：〈《風雨談》其言論的真實與虛構〉，《淪陷下的北京一九三七一四五：交戰中的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東京：三元社，2000年），頁115。

人，大約總是不大願意開口的。²²

來到天皇制法西斯主義盛行的日本，柳雨生的心情不斷被「奇異」侵襲，「寂寞」和「空虛」在內心來來去去，然後對相信「真理」和「正義」在自己手中，堅決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日本人，宣傳戰爭的空虛和愚昧，阻止他們的想法。

〈異國心影錄〉中，不止這一處，其他地方也反覆使用「寂寞」這一詞。例如在菊池寬家作的詩就寫道，詩的境地為「寂寞與真誠」，「寂寞是我自己的心境，真誠是我對別人的態度」²³，寫這篇小文的時候也提到自己「雖在苦痛的寂寞中」²⁴。

刊載〈異國心影錄〉的《古今》為朱樸四二年三月所創刊。朱樸為汪精衛政府的重要成員，加上周佛海又給了許多贊助，因而這本雜誌一直被視為汪派的刊物²⁵。這樣的雜誌通常不會夾雜妨礙中日親善的不純文章，但柳雨生〈異國心影錄〉的主調雖為「親日」，底層卻以「寂寞」作為伴奏調。

（四）《風雨談》創刊

四三年四月，柳雨生創刊文學雜誌《風雨談》。《風雨談》從創刊到第十六期為止（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每一期都有四十頁厚度的大型文學雜誌，但從第十七期開始卻大幅減少至三十二頁。隨著日本戰況惡化，物價高漲，紙量越來越不夠，最終在第二十一期（1945年8月）停刊。第九期「編後小記」中表明編輯方針「本刊的理想是一個純文藝的刊物，並非是一個綜合雜誌」、「本刊注重創作甚於翻譯，注重優秀的作品甚於作者的聲名，注重正確的批評甚於捧場的阿諛」²⁶，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沉寂已久的上海文學界投下一顆震撼彈，充分展現柳雨生的氣魄。《風雨談》在日本陸軍報導部管理下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印刷、出版，標榜文學雜誌，因而正面評論政治或戰爭的評論一篇也沒有刊登，也沒有刊登宣傳建立或發揚「大東亞精神」的直率的「親日」作品。這本雜誌刊登了周作人、柳雨生的散文；潘序祖、丁諦的短篇小說；路易士、南星的新詩、譚正璧、羅

²² 柳雨生：〈異國心影錄〉，頁82。

²³ 同前註，頁89。

²⁴ 同前註，頁90。

²⁵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頁364。

²⁶ 〈編後小記〉，《風雨談》第9期（1944年1、2月合刊），頁173。

明的劇本；譚惟翰、蘇青的長篇小說等。

柳雨生為了出席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再度來日時，河上徹太郎如此描寫：

前一晚（四三年九月五日），我依然接待訪客到深夜，十二點左右，我回到房間，到浴室洗澡，聽到柳雨生一邊叫我：「河上兄，洗澡嗎？」一邊進來。他似乎在等我回來。坐下來以後，他跟我說想說明上海文化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報告給我聽。……他從去年第一回文學者大會結束回國後，便立刻離開新國民運動促進會，到上海當新聞工作者，正是因為覺得沒有比文學運動更正確的文化運動了。尤其是他非常喜歡今年春天自己創刊的雜誌《風雨談》，和我講了一些不必要的解釋，說第七號開始會很充實，請看一下等……。不過才二十七歲的青年，將所有文學者在事變以來首次動員，實在是相當大的成就，不過，他說他想要慢慢回歸寫作生活，只發表文章在《風雨談》上。²⁷

四二年五月以後，柳雨生以汪精衛政府宣傳部的身分反覆發表政治口號，但在《風雨談》創刊後，可以看出他只打算在文學界當個文學家。四三年五月四日，在《大陸新報》投稿〈東亞文學的戰士〉一文，表明：「實際上我有堅定的決心，想成為為東亞新文學奮鬥的戰士。我是一位文學家，並非一位政治家。我失去政治的興趣，但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全力愛國、全力報國之秋，文學正應該成為這種運動的底層力量。」然而柳雨生在太平洋戰爭中所發表與時勢有關的評論及論說中，多透露自己「和平運動的戰士」的立場，要從小說或隨筆中找出「東亞文學的戰士」的立場並非易事。

柳雨生出版太平洋戰爭時收錄二十四篇隨筆的《懷鄉記》（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5月）及收錄九篇短篇小說的《撻妻記》（上海：雜誌社，1944年11月）。《撻妻記》我還沒看過，其中有一篇〈排雲殿〉（原載《春秋》第3卷第6期〔1944年7月〕），以北京為舞臺，描寫良家女子對大學生的淡淡愛戀。捕捉登場人物的外貌、動作、心理狀態的筆觸相當纖細且流暢。陳青生評《撻妻記》，認為是「一部描寫大多數男女婚姻和愛情的故事」，「主旨為展示和品味人生的溫馨情趣」²⁸。

《懷鄉記》所收的隨筆中，最後三篇〈異國心影錄〉、〈海客譚瀛錄〉、〈女

²⁷ 河上徹太郎：〈中國代表的決心〉，《文藝》第11卷第10號（1943年10月），頁21。

²⁸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頁247。

畫錄〉，敘述為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二度訪日的見聞，其他的隨筆多是母校北京大學校友的軼事、中國各地的風俗習慣、觀劇後的感想等，與日本和時勢沒有太大關係。柳雨生在太平洋戰爭中寫的小說、隨筆中，最可以窺探其「東亞文學戰士」思想的，大概就是《懷鄉記》所收的最後三篇了。陳青生評這三篇，認為「歌頌當時的帝國主義日本，美化並鼓吹日本帝國的『大東亞聖戰』及『大東亞共榮圈』稱霸構想」²⁹。〈異國心影錄〉先前已經提過，描寫作者的「寂寞」心情。四三年八月完成的〈女畫錄〉，突顯這一年間，每次參加日本文學家的座談會和茶會，交流卻僅止於表面，沒有任何成果的失落感。柳雨生在序言裏也提到這三篇，引用陶淵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透露這三篇的實際意義遠在言外。又說如果熟讀這三篇，「應該可以觸摸被掩蓋的清淨之地，察覺作者的寂寞與苦惱」³⁰。柳雨生少數三篇「親日」的文學作品中，顯露出「寂寞」、「苦惱」與「失望」。

（五）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於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起三天期間，於東京舉行。中國代表十七人，其中上海代表周越然、邱韻鐸、陶亢德、魯風、柳雨生、關露六名³¹。柳雨生於本會議最後一天——二十七日，介紹中國的文學雜誌出版動向、日本文學的翻譯狀況，以及電影和戲劇界的新動態等。二十八日晚上出席在九段軍人會館舉行的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講演會，以「告日本文學界……」為題，進行演講。演講原稿原文刊登於《中華月報》（1943年11月），日譯刊登於《文學報國》（1943年9月20日），「回頭看看，如果日本沒有發動大東亞戰爭的話，我們中國人應該依然苟且偷生過活，在奴隸一般卑下的境地呻吟著吧」，其中充滿不少親日的生動言詞。

文學者大會外地代表於九月一日離開東京，到名古屋、伊勢、大阪、奈良、京都參訪，七日抵達下關，各自歸國。在大阪迎接外地代表一行人的織田作之助如此描寫柳雨生：

一行人坐兩臺巴士前往宿舍新大阪旅館，迅速吃完中飯後，柳雨生瞬間換好

²⁹ 同前註，頁260。

³⁰ 柳雨生：〈序〉，《懷鄉記》，頁3。

³¹ 上海代表六名中，邱韻鐸、魯風、關露三名為中共地下工作人員。

和服來到大廳，正好日本的代表喊著「柳先生是誰呀」，一聽到後，柳雨生便微笑著轉身，拖著掛有黑色鞋套的草鞋進了食堂。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令我相當吃驚。³²

雖然不清楚柳雨生採取這樣行為的真意如何，但以織田作之助等為首的日本文學家們應該是喜歡並且接納這位愛好日本文化且開朗又善於交際的青年吧！

九月六日下午，河上徹太郎、林房雄、小林秀雄、沈啟无、蔣義方、草野心平、柳雨生等七人於京都進行懇談，討論設置翻譯機關、留日文學研究生、強化中國出版界、組成中國文學統一團體等話題。柳雨生回國後，為了創立中國文學統一團體，四處奔走。四四年一月，南京政府宣傳部召開的中國文學協會設立準備會議上，決定宣傳部顧問草野心平、南京代表龔持平、上海代表柳雨生調任北京。四四年二月，柳雨生等三人前往北京，針對華北文學代表者及文學協會設立等事進行協商。四四年四月一日《大陸新報》報導中國文學協會將於五月「聚集首都南京，舉行盛大的創會儀式」，此計畫最後因種種的原因停擺³³。

（六）第三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四四年十一月，南京舉行第三回東亞文學大會。中國方面有四十多名參加，上海代表為周越然、包天笑、傅彥長、張若谷、楊光政、路易士、陶晶孫、潘序祖、柳雨生、邱韻鐸、楊之華、顧鳳城等十二名。此時，日軍於馬里亞納海戰慘敗（1944年3月—7月）、塞班島失守（1944年7月）、茵帕爾作戰慘敗（1944年3月—7月）及各地陸續敗退，戰局極度惡化。大會前一日，汪精衛去世的消息也傳到與會者耳裏。就像岡田英樹說的一樣，「武者小路、周作人畫了兩個眼睛，不等主辦的文學團體到來，被冷眼圍觀的第三次會議，並非一個令人期待且有長足成果的大會」³⁴，在沒有實質成果的情況下閉幕了。

³² 織田作之助：〈舉止充滿親愛〉，《文學報國》，1943年9月20日。

³³ 岡田英樹〈第三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真相〉（《淪陷下的北京一九三七—四五：交戰中的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頁80）指出中國文學協會設立計畫停擺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周作人批判片岡鐵平一事及「沈啟无破門聲明」的影響。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年〕，頁114）則認為原因是因為許多的文學家厭惡官方主導的組織等。

³⁴ 岡田英樹：〈第三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真相〉，頁81。

四、日本戰敗後

蘇青《續結婚十年》第十七章〈驚心動魄的一幕〉描寫逮捕魯思純（以陶亢德為模型）、潘子美的場面。四五年初秋某夜，被某局的男子帶到某所的蘇懷青，拒絕去魯思純和潘子美的家把兩人帶出來。當局唯恐魯思純和潘子美被逮捕的消息曝光，便載著蘇懷青到魯思純和潘子美的家前，蘇懷青被留在車內，等到兩人被逮捕後才放回家。金戈在〈陶亢德受捕一瞬〉中寫道：「某一夜，當局收到逮捕陶亢德、柳雨生的命令，兵分兩路，一小時二十分鐘左右就將兩人逮捕。」³⁵〈驚心動魄的一幕〉和〈陶亢德受捕一瞬〉的內容多少有些出入，但柳雨生跟陶亢德同一晚在自家被捕應該是沒有錯的。

上海高等法院於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後，上海提籃橋監獄內設立上海看守所及臨時法庭，所有漢奸的案件都是在此審判的。四六年四月四日《申報》報導，四月三日七十一名大漢奸押送上海提籃橋監獄，柳雨生的名字也出現在七十一名的名單中。四六年五月十六日，柳雨生的公審開始。五月十七日《申報》刊登柳雨生的罪狀，同時附載公審時的照片。

柳雨生 文化漢奸，廣東南海人，三十歲，（文字不明，中略）隔年五月回上海，立刻加入偽宣傳部擔任編輯部的職務，替林柏生辦事，拉攏許多文化作家。同時為《中華日報》編輯者，數度發表謬論，宣揚「和平運動」。又為敵方所經營文化機關「太平出版公司」編纂《新國民運動論文集》，翻譯成日語，頗受敵方讚賞。（以下文字不清，省略）

六月一日《申報》報導，五月三十一日判決「文化漢奸」柳雨生「試圖通敵國反抗本國。判牢獄三年，褫奪公權三年，除了家人生活所需之外，財產全部沒收」，「柳雨生聽了判決以後，浮上笑容，妻子也笑了」。

漢奸判官對陳公博、褚民誼等汪精衛政府要員判以極刑。被視為文化界的巨奸周作人被首都高等法院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的有罪判決，上訴後最高法院減刑為十年。再看看柳雨生身邊的人，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海社會福利局長周毓

³⁵ 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頁99-101抄錄了金戈〈陶亢德被捕的一瞬間〉（收入《捕奸錄秘》〔上海：青年文化出版社，1948年〕）。

英及中央電訊社編輯長許錫慶有期徒刑八年，出席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中華周報》編輯長陶亢德表示接受三年有期徒刑。柳雨生代表上海「親日」文學者，出席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三次都出席的中國人只有柳雨生一人，所以柳雨生可能覺得，有期徒刑三年的判決比想像中還輕。

於四五年三月到四七年一月生活在上海的崛田善衛，看了柳雨生的經歷以後，這樣寫道：

「終戰」事實上在八月十一日已降臨上海。當時，我也不管自己沒有錢沒有能力，一直透過別人的耳語，帶著用刺物刺胸的心情，了解協助日本的中國人的命運。我和柳雨生與陶亢德等人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我卻特別注意這回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文學家的命運。柳雨生當時為二十八歲（我自己是二十七歲），柳、陶兩人於一九四六年因叛亂罪各處三年的有期徒刑。陶家在戰後就行蹤不明，而柳家一家，四六年一整年，我和室伏小姐不時拿著遭遣返同胞的日用品，深夜偷偷地去看他們。因為之前的交集也說不上特別多，只見過一次，所以忍不住想要見他。我們當時都有所覺悟，要是被捕，我和室伏小姐兩個人應該也會被判協助漢奸罪吧！我們兩個人前後戒備，輕輕地接近柳雨生太太和母親及小孩居住的家裏，心裏想著，這些企劃、組織大東亞文學大會的人，例如邀請這兩位參加的日本傑出文學家，對這兩人的命運有什麼看法等事情。兩人於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以前，刑期屆滿出獄了。／我在印刷廠的門前，呆立著，我想像自己各種可能做的事情。／和異民族的交涉是相當徹底的。柳雨生、陶亢德，都是死。文學者就是死路一條。其中陶氏比我年長，處事態度各方面都讓人感覺不是單純的人，柳雨生就是個年輕人而已。中國的文學史如果要作記錄的話，大概會把他當作是出賣靈魂給敵人的文學者，也有可能因為戰事忙碌，這些人也沒有任何名作，就被忽略掉了吧！³⁶

而河上徹太郎也在六四年，回憶起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的代表，寫了如下的文章：

那時的「中國代表」現在過著怎樣的生活呢？一想到這，我就不得不築起良

³⁶ 崛田善衛：〈關於異民族交涉〉，《崛田善衛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94年），第9卷，頁177-180頁，原載於《季刊・現代藝術（三）》（東京：Misuzu書房，1959年6月）。

心的壁壘。從上海來的柳雨生，體型小，留著小鬍子，菊池先生相當照顧他。政治真的很恐怖。我一九年十一月去上海，在那通貨膨脹的年代，柳雨生請了我一大堆當時盛產的螃蟹，我全身洋溢著感動之情。是一位會用毛筆細字寫信寫得相當好的青年。³⁷

崛田善衛和河上徹太郎十分掛念，生活在共產黨政權下的元「漢奸」柳雨生，被截斷文學家的生命，生活一定飽受精神和物質上的煎熬。崛田善衛卻偶然在草野心平〈夏威夷日記〉中得到柳雨生的消息，崛田善衛在閱讀時，發現有一節「七月二日（星期三）〈第二回講義〉2 P.M.→4:40 P.M.，老朋友柳雨生（存仁）突然出現，嚇了我一跳」³⁸。崛田善衛立刻寫了「柳雨生還活著真的是最近最吃驚的事情」的一封信給草野心平。草野心平於七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東京新聞》發表與柳雨生重逢的經過：〈柳雨生還活著〉。草野心平六八年六月訪問香港的時候，從故人那兒得知柳雨生任教於雪梨大學。隨後在美國的柳雨生來信，兩人便約定六九年六月到九月草野在夏威夷的時候相聚。

七月二日，柳存仁突然出現，剛好是第二次上課之前。是柳雨生。八成是他。跟以前一樣帶著細金邊的眼鏡，體瘦的聰明美男子，跟以前不一樣的是長了一些白髮，並且用英語說話。他進來我的教室，和學生一起坐下。……我們一起被楊格教授請吃威洛斯夏威夷式料理，他也來我宿舍兩三次，但分開以後，我就再也知道他的消息了。他現在在牛津唸文學學位，應該去了英國吧，他也沒有多問我什麼。

戰爭中，草野心平與柳雨生同屬汪精衛國民政府宣傳部。兩人也都一起出席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草野心平因為是日本人，沒有被問罪，柳雨生卻因為是中國人而被扣上「漢奸」的罪名。草野心平知道柳雨生在海外活躍的時候，應該鬆了一口氣，所以才對遭逢曲折的異國老友的战後發展沒有追問吧！但兩人的沉默，也正巧透露難以抹滅的戰爭傷痕吧！

柳雨生於五二年，逃離共產黨政權下的中國，移居香港。擔任皇仁書院的中文教員，投入校內的戲劇活動。香港時代的柳雨生曾出版小說《庚辛》（香港：大公

³⁷ 河上徹太郎：〈大東亞文學者會議〉，《河上徹太郎全集》（東京：勁草書房，1969年），第2卷，頁439，原載於《週刊讀書人》，1964年4月6日。

³⁸ 草野心平：〈日記〉，《風景》第11卷第4號（1970年4月），頁21。

書局，1952年）、研究專書《中國文學史》（臺北：東方書局，1958年）、話劇劇本集《在舞臺的邊緣上》（香港：齡記書店，1959年）等。柳雨生在六二年，放棄香港的安定生活，前往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擔任為期三年的約聘教師。六六年擔任助理教授，一直工作到八二年退休為止。澳洲時代的柳雨生於中國小說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方面有相當顯著的成果，以漢學家的身分博得不少國際榮譽。代表著作有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2)、*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 J. Brill, 1984)、《和風堂新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道家與道術——和風堂文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另外九八年也受母校北京大學之邀，進行演講，二〇〇〇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含演講的論文集《道教史探源》。九二年研究成果受澳洲政府表揚，授予澳洲勳章(AO)。

五、協助日本的實情

柳雨生在太平洋戰爭前使用本名「柳存仁」，戰時使用字「柳雨生」發表文章。戰後再度署名「柳存仁」。柳雨生出獄後，應該是為了與過去區別，邁向新的人生，才停止使用「柳雨生」的名字吧！柳雨生於六八年出版長篇小說《青春》，描寫清末至二五年舊家庭的生活變遷，於香港星島日報社出版。這本書是以柳雨生自己的家庭作為模型，可以窺知柳雨生的出生和幼年期的生活環境。然而柳雨生卻從未以自己為模型，寫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小說，連文章都沒有寫過。

柳雨生少數提到的戰時文章，其中之一只有描述周作人的回憶〈知堂紀念〉（1989年）。柳雨生在這篇文章裏，覺得周作人的散文「然而也許就是因為它貌似閒適，作者在『忍辱與苦』的年代裏能夠借著『確信是儒家的正宗』的幌子籠罩之下，說出幾句清醒的話來」，例如告誡國民重視團結的本國標語的文章，促使大家學習歷史教訓的文章，又舉例周作人曾寫過「利用儒家的老招牌，為人民大眾爭得生存權利的文字」³⁹，試圖洗刷周作人「漢奸」的汙名。

³⁹ 柳存仁：〈知堂紀念〉，《道家與道術——和風堂文集續編》，頁313-318，原載於《明報月刊》第281-282期（1989年）。

柳雨生在北京大學時也曾上過周作人的課，也在自己擔任總編輯的《風雨談》上，屢屢刊登周作人的文章。即使戰後移居香港，也數度與周作人通信往來，與周作人長年保持聯繫。又如譚正璧所說「讀他〔柳雨生〕的文章就會聯想到周作人先生」⁴⁰，柳雨生的學問也深受周作人的影響。兩人都是語言能力極好，精通英、日語，德語、法語也有相當高的閱讀能力。兩人的學問也是博古通今，東西兼備，研究涉及歷史、宗教、文學、語言等多領域。周作人對柳雨生來說，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師，文章風格和學問態度兩方面都深受影響。

然而柳雨生和周作人卻同樣因為「漢奸」而被判刑，但不管是從協助日本的程度或內容來看，兩人的立場都有本質上的差異。木山英雄評論戰時曾經擔任「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等的周作人，認為「無論是韜光養晦、為了反抗，或者為了自己的名聲，他的『儒家』態度早已登大雅之堂，至少看不出他無情地被命運玩弄，或者從他自己不願意好好利用這種命運的跡象」⁴¹。

柳雨生和周作人相比，明顯年輕且缺乏人生經驗。周作人於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決定留在日本人占領下的北京，時年五十三歲。而柳雨生在事件爆發後失去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機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最後在四二年五月回到日本占領的上海，當時僅二十五歲。

柳雨生回到上海後，立刻加入汪精衛政府宣傳部，效力於政策宣傳。柳雨生於〈異國心影錄〉中寫道：「我的個性雖然並不是與歷史政治絕緣，而生活環境的束縛，也往往與整個局勢有關，但我更愛好單純生活的愉快，生活的美，以至於最奇妙奇特的所謂止於至善的境地。」⁴² 柳雨生在中學時代就向雜誌投稿散文和小說，中學畢業前還自己出版文學史的書，對他這種文學青年來說，「文學」才是能帶來最高快樂的「至善境地」吧！然而戰爭使既有的社會秩序崩壞，世界呈現一片混沌之時，年輕且富有才華的柳雨生因為嚮往那樣的世界，所以不停歇地積極關心「和平」派政治和歷史。從四三年前後，把活躍的舞臺再度轉移向文學世界，當時的著名作家及中堅作家或者離開上海，或者擱筆隱居，柳雨生在這種空洞化的上海文壇

⁴⁰ 譚雯：〈柳雨生論〉，《風雨談》第14期（1944年8月），頁36。

⁴¹ 木山英雄：〈周作人與日本〉，《漫談日本文化》（東京：筑摩書房，1937年），頁280。

⁴² 柳雨生：〈異國心影錄〉，頁81。

中急速興起，四二年十一月被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選為最年輕的中國代表，也因此戰後被冠上「漢奸」之名，柳雨生藉由這次的大會，與日本文壇架起橋樑，積極地加入與日本學者的交流和合作。

柳雨生在戰時寫的隨筆〈學優〉中有以下的一段話：

我想人生如劇場，如舞臺，我們大家都在唱戲，上智的聖賢豪傑也是我們，奸宄欺詐的強豪也是我們，都要看我們自己怎樣做法。既然登上了舞臺，為人為己，都要轟轟烈烈的做上一番大事業。⁴³

柳雨生參與協助日本的原因，應該是因為他自己的判斷認為比起「抗戰」，「和平」更能救國，並受到歷史波動的刺激，將自己投身於其中，企圖完成「和平救國」的大業。但就如劉傑所指出的，「日本的『和平工作』裏，『謀略』色彩太強烈，因而大多的妥協派都變成是『漢奸』」⁴⁴，中國最終不是用「和平」而是用「抗日」贏得勝利及解放，所有的「漢奸」也因而入獄。在這裏我們不可能清楚且有條理地分析、說明這位在日本占領下的上海生活過，且早熟的文學青年的人生意義。然而柳雨生這位矛盾戲的主角，一邊站在舞臺上，一邊用內心深處凝視的，應該就是「寂寞」了。

崛田善衛指出：「一般人不自覺的會陷入一種宿命論，覺得那些漢奸也是自己想要加入日本陣營，所以也不是不得已。」⁴⁵對於協助日本的人直接歸入「漢奸」掩埋在歷史中，倒不如一個一個地進入他們的內心，捕捉他們的起伏，這也是筆者將來需要持續關注的課題。

⁴³ 柳雨生：〈學優〉，《懷鄉記》，頁 81。

⁴⁴ 劉傑：《漢奸裁判》（東京：中央公論社，2000 年），頁 256。

⁴⁵ 崛田善衛：〈在上海思考的事情〉，《崛田善衛全集》，第 14 卷，頁 445，原載於《中國文化》（1947 年 6 月）。